



重访星火之地

市委党史研究室协办

天台县赤城街道桐柏村,有一革命老区——

凝固的历史遗存,跃动的天台蓝田

本报记者陈洪晨 本报见习记者元 萌/文
本报记者杨 辉/摄

车窗外,空气带着山雨初晴的清甜,左侧竹林葱翠,右侧梯田层层叠叠,沿着盘山公路不知拐了几道弯,在两排小红旗的指引下,天台县赤城街道桐柏村蓝田自然村浮现在眼前。

90多年前,这个小山村发生过两件大事——1928年9月,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会议在此召开;1930年3月,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组织桐柏暴动,指挥部就设在此处。

如今,这个村庄依然保留着革命老区的原始风貌,家家户户都是红色后代,人人都能讲述村庄的光辉历史。为了推动老区振兴发展,他们身体力行地践行着不畏艰苦、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

中共浙南特委成立

行至村口,“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会议会址”几个红色大字装点在一块碎石块垒砌的残垣上,仿佛在提醒来者,这是村庄醒目的标识和村民引以为傲的历史。

1928年9月,为加强党对台州和温州各县秋收斗争的统一领导,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召开台、温两地党的代表大会,成立中共浙南特委,领导台属六县和温属四县党的工作。

“当时,天台的党组织比较健全。而蓝田村地处桐柏山区,四周重峦叠嶂,方便隐蔽。全村20户人家都是佃农,家家有党员,建有中共蓝田村党支部,中共天台县委负责人也经常在这里活动。”桐柏村党总支书记蒋明霞介绍,经过会议筹备人员的分析,这次重要的会议最终确定在天台县蓝田村召开。

这段历史,77岁的村民梁达苗从小就听过许多遍,他的父亲是当年的亲历者之一。“各地代表白天带着雨伞,晚上提着灯笼,以这两样物品为暗号,在国清寺接头。蓝田村党支部书记梁子考和几位村民把代表们护送到村里,安顿住下。他们在国清寺路廊等了三天,

才把所有代表都接齐。”

9月下旬,中共浙南代表会议在蓝田村召开。参加会议的有省委特派员龙大道,中共六大的浙江工人代表黄祥生,浙南特派员管容德,温州代表林去病,临海代表王逸仙,黄岩代表钟鼎文,宁海代表袁佐文,天台代表石瑞芳、包定等。

会议为期三天,第一天传达了党的六大精神,第二天讨论,第三天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南特别委员会,管容德、林去病、王逸仙、钟鼎文、袁佐文5人任委员,管容德为书记,林去病、王逸仙2人为常委。

“开会的地方就在梁子考家。会议期间,代表们的食宿由村党支部负责,村里的党员在周边山岗巡逻、放哨,确保会议安全举行。那几天,家家户户都自发地为这件事奔走、出力。”梁达苗说。

中共浙南特委的成立,推动了台州、温州两地农民运动的开展。召开会议的旧址,如今还留存于蓝田村。这是一座两层六间的小楼,是天台山区常见的外墙为块石砖头、内墙为木料框架、屋顶为青瓦的民居。

梁子考的后代将这处祖宅无偿交由村集体管理,目前作为红色展示厅免费对外开放,一层展陈着图文展板,二层有医药箱、回忆录等实物展品。

桐柏暴动

1930年3月初,中央军委派胡公冕来浙南领导武装斗争,建立浙南红军游击总指挥部。3月中旬,按照浙南红军总的军事部署,中共台州中心县委委员杨敬燮到天台建立红军,组织桐柏暴动,准备攻取天台县城。

因为蓝田村进可攻、退可守的地理优势,杨敬燮选择将这个村庄作为立足点,设立桐柏暴动指挥部。指挥部同样设在了梁子考的家。

天台境内各路武装460余人,陆续汇集到小小的蓝田村。一时间,蓝田村人欢马跃,四处挂起“浙江工农红军”的红色横幅,张贴“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分田分地”“救济贫苦”等标语。

3月28日,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正式成立,杨敬燮为总指挥,陈天保为副总指挥,纵队指挥部机构也相继成立,许成枝负责参谋处,周传帽负责军事处,袁和负责总务处。

“蓝田村男女老少在村党支部的带领下,全村出动站岗、放哨、送饭和收集情报。梁人泉(梁子考之子)请来铁匠和老猎手打造尖刀和土手雷,派村里的党员到城区运送子弹和火药……”梁达苗说。

杨敬燮率领浙江工农红军第二纵队连打两次胜仗,震动了全县。国民党省政府接到天台县政府电报后,调集大批援兵,赴天台镇压。

桐柏暴动指挥部决定向崔岙石坦一带转移。为了迷惑敌人,掩护大部队转移,蓝田村及周边村群众和留守桐柏山的战士们一起,扎了许多稻草人。风吹草



行至村口,可以看到“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会议会址”几个红色大字。

动,稻草人时隐时现,好像红军战士布满山头,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天台的革命力量坚持战斗了数月,在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下,桐柏暴动以失败告终。

尽管如此,这次暴动仍然意义重大。它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各地农民武装暴动的组成部分,是中共台州中心县委直接领导的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封建地主恶霸豪绅等反动势力,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力,为红十三军在浙南的建立增添了力量。

革命老区新生机

历史的篇章早已翻过了惊天动地的一页,山外的世界翻天覆地,蓝田村却仿佛凝固在历史长河之中,无论是周围的自然环境,还是村里的房屋建筑,都没有太大变化——石头和砖瓦木料混合的老屋依山而建,黄泥和石块铺成的小路穿村而过,部分房屋长期无人居住,已坍塌破败。

这一切,有着令人动容的历史原因。桐柏暴动失败后,蓝田村被国民党军队洗劫一空,房屋被砸,财物被抢。幸存的村民四处逃散,流亡在外无家可归,生活十分困难。蓝田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无人居住的荒村。

“过了五年,有胆子的村民偷偷回了家。又过了十年、二十年,陆续有村民回到故乡,住进破败的祖宅。”蓝田村原主任梁允江今年65岁,这些风雨飘摇的往事是他小时候听祖辈、父辈说的。

如今,参加过桐柏暴动的老一辈村民都已过世,留在村里的家家户户都是红色后代。梁允江介绍,蓝田自然村现有30多户130余人,常住的只剩十余人,“山区偏远,孩子们上学不方便,青壮年都带着孩子到城里打工去了,只有老人不愿意离开故土”。

由于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人口稀少

等种种原因,数十年来,这个村庄的发展停滞不前。

近年,随着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兴起,偶有“不速之客”到访山村。只要来者感兴趣,每个村民都能对蓝田的光辉历史侃侃而谈。但老人们只会说天台方言,游客听得一知半解,传播效果有限。

去年,蒋明霞当选为桐柏村党总支书记以后,时常到这个自然村走访,和老人们谈心。这个经济落后的山村,在他看来,是青山绿水间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有着闪闪发光的前景。“蓝田革命老区是珍贵的红色旅游资源,如果进行保护和开发,既能促进天台的旅游事业,又能带动山区经济发展。”

他邀请了不少专家实地考察,初步拟定了发展红色旅游的思路:“旧址和村居修旧如旧,保持革命老区的原始风貌;通过讲解和活动,活态传承革命精神;发展民宿等业态,为有意愿回村的年轻人提供工作机会……”

这些尚未成形的想法,让寂静的山村的山村热闹了起来。

采访当天,十余位村民在村口热火朝天劳动,妇女们穿着高筒靴,拿着锄头和铁锹锄杂草、清淤泥,男子一筐筐一簸箕地运走垃圾和碎石。

蒋明霞认为,要振兴革命老区,首先要提升村容村貌。“我一提议,全村上下都很支持。你看,这个老太太88岁了,身子骨还很健朗,她也来帮忙了!”

村民的热忱与团结,让这个新上任的村书记感触颇深:“村民们不怕困难、不计得失,一心为村子的发展做贡献,这不正是革命精神最好的传承吗?”

他告诉记者:“你可能想象不到,就在五天前,村口还在使用露天粪坑。为了村子长远的发展,村民们自发拆除了。现在大家干劲很足,村子每天都有新变化。”

阳光下,村民们挥洒汗水,迎难而上的背影里,写满了对未来发展美好生活的期许,一如他们的祖辈和父辈90多年前坚定信仰的那样。

本文参考了《中共天台地方史》

第十二站 天台县赤城街道福溪街道



党员干部在蓝田村重温入党誓词。



游客参观桐柏暴动指挥部遗址。



这座民居是中共浙南特委成立会议会址,也是桐柏暴动指挥部遗址。

“我们在烽火中成长,我们在烽火中教育。维我大公,作育人才,自动自觉;维我大公,唤起民众,复兴民族……”上世纪30年代末,天台大公中学有过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

如今,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天台大公中学走上优质发展之路,“大公有为”的校训在这所现代化学学校里传承着。



现代化的新校园。



2018年,“大公中学”的校名被重新启用。

浙东“陕公”大公中学

本报记者陈洪晨 本报见习记者元 萌/文
本报记者杨 辉/摄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上海大公职业学校创办人林美衍在天台创办大公中学分校,于1937年10月24日正式开学。

“当时,除了租用两座祠堂,做了几套课桌椅和几块黑板外,什么都没有。”根据知晓那段历史的老人回忆,创办之初,大公中学分校非常简陋,也并非进步学校。几个月以后,许杰、戴介民、袁佐文等一批进步人士开始担任校长、教导主任等行政职务和主要教学工作。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亡政策,第二期开学不久,便与中共天台县委取得联系。时任天台县委书记齐德夫每周六出席大公中学的校务会议,县委先后派顾哲民、胡其清到大公中学负责党的工作。大公中学迅速形成了鲜明的教育特色,成为党领导的一所“陕公”式学校。

1938年上半年,许杰、袁佐文、戴介民

等在学生中建立了一个“核心小组”。至5月,建立了大公中学“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谢楚炎任队长。到了年底,队员已发展到200多人。暑假前,大公中学党支部成立,谢楚炎任支部书记。1939年上半年,党员人数增至120多人。

党员的蓬勃教育,使大公中学成为中共天台县委在文化教育领域的重要阵地。

二

1938年春,在进步师生的强烈要求下,大公中学实施“战时教育方案”——教育内容由教师根据抗战形势的需要,以抗日救亡为主要内容自编教材;教育方法提倡“四个结合”,即理论教学与宣传活动相结合、课堂教育与课外读书活动相结合、校内读书与校外社会活动相结合、思想政治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相结合。

学校成立了墙报组、民教组、民运组和街头演讲组等,组织学生走向社会,广泛开展宣传。每逢集市,学生就三五成群地上街演讲,唱革命歌曲,出《大公报》,还组织了大公剧团,

主要演出剧目有《拾手榴弹》《杀日寇》等。民教组在城区和郊区办起了民众夜校和识字班,学生去当“小先生”,给群众上课。学生党员与积极分子还配合中共天台县委深入农村组织农会,进行“二五”减租和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组织。

大公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不久就闻名全省各地。到了1938年暑假前,温岭、黄岩、临海、宁海、三门、新昌、嵊县、上虞、鄞县等地有许多青年前来求学。

在中共天台县委的领导和进步教师的努力下,大公中学在天台的抗日救亡运动中起到了先锋作用,为党培养和输送了一大批干部。

1940年6月,大公中学被国民党政府勒令停闭,落入历史的尘埃。但它产生的深远影响,在中共天台县委党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

1940年以后,大公中学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学校数易其名,几度停办,在



通过联合办学,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天台大公中学走上优质发展之路。

很长一段时间以“天台县福溪中学”的名字续写教书育人的历史。

近年来,天台县与浙江师范大学签订了合作办学协议,投资新建了现代化的新校园,并决定重新启用“大公中学”的名字,福溪中学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附属天台大公中学”。

2018年,不再适应发展需求的老校舍(大公中学原址)被拆除,搬入新校区以后,学校搭上了联合办学、优质发展的快车道。该校校长夏积武介绍,除了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行为规范养成教育,提倡“走好路,跑好操,就

好餐,读好书,做好人”。两年多来,这项教育颇有成效,特色跑操、规范行走、安静就餐、文明礼貌等,已经成为校园里靓丽的风景。

学校另一项特色教育,就是邀请天台县新四军研究会成员等来校作专题报告,并在思政课和德育课上融入党史教育,让每位大公学子了解抗日战争初期大公中学的光辉历史。

“遗憾的是,关于大公中学不同阶段的校史,留存的照片、实物资料并不多。目前,我们正在通过校友寻找大公中学的印记,希望在未来进一步把大公精神挖掘好、提炼好、传承好。”夏积武说。